

武威历史上的战略地位与军事威名

□ 李元辉



Cultural Gansu 甘肃

明清时期:三边重镇,五郡喉襟

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端,古称凉州,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要冲,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咽喉。武威“襟带西蕃,葱右诸国”,“通一线于广漠,控五郡之喉襟”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汉武帝开河西至明清时期,历史的长河曾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、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,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。

两汉时期:天下要冲,国家藩卫

东汉末年,一场有关凉州的争论在朝廷进行。当时凉州西羌反叛,朝廷征伐失利,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。汉灵帝刘宏诏令百官在朝会上讨论,议即傅燮厉声反驳道:“凉州是天下要冲,国家藩卫,岂能轻易放弃?”强烈建议不能放弃凉州。最终,刘宏认同了傅燮的见解,决定继续治理凉州。“天下要冲,国家藩卫”,短短八个字,说出了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,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黄金节点,也是沟通中西、连接欧亚的交通要冲,更是守护长安乃至关中一带的重要屏障。

一、汉武开疆,武功军威

西汉初年,匈奴占据河西之地,对西汉王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。为解除西部边境的威胁,打通西域,公元前121年3月,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骑兵自陇西出塞,进攻河西。霍去病率军翻越焉支山,打败匈奴浑邪、休屠二王的主力部队,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。后又在皋兰山下,斩杀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,胜利回师。这年夏,汉武帝又命霍去病率领数万骑兵进攻河西。霍去病深入河西二千里,把匈奴势力彻底赶出了河西。匈奴人哀歌曰: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河西之战后,西汉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,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,实现了“断匈奴右臂”的战略目标。为了彰显大汉的武功军威,此地得名武威。公元前104年,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,率军征讨大宛,获三千余匹汗血宝马凯旋,威震西域。汉武帝远征大宛,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长途远征,不仅重新开通了西域商道,也为日后汉朝对西域进行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。汉武帝得到汗血宝马之后,欣喜异常,正式将其冠名为“天马”,并写下《天马歌》加以称颂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,“自武威以西……地广民稀,水草宜畜牧,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,凉州遂成为养殖繁衍天马的重要场所之一。1969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就是以汉代天马为原型铸造的,铜奔马成为大汉王朝开疆拓土、征战沙场、驰骋河西、英雄业绩的象征。

二、烽燧相望,蛟龙蜿蜒

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南下,保卫河西地区的安全,保障军事防御之需要,在包括武威郡在内的河西四郡修建长城。作为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,武威汉长城覆盖全市一区三县,大体为东南—西北走向,长约188.4公里,其中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49.7公里,古浪县68.85公里,凉州区55.15公里,民勤县14.7公里。汉长城在武威按墙体和壕沟(壕堑)两种形式修筑,其间燧、墩、堡、城连属相望,所谓“五里一燧,十里一墩,卅里一堡,百里一城”。武威汉长城历两千年风沙雪雨,虽多已倒塌,仅剩一些残垣断壁,但有些地段仍坚固如磐,屹立于戈壁沙漠之中,如蛟龙蜿蜒,气势不凡。汉长城不仅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,而且也是关内外各民族进行经济、文化交流的纽带。

三、烈士武臣,多出凉州

“关西出将,关东出相。烈士武臣,多出凉州,土风壮猛,便习兵事”,这是《资治通鉴·汉纪·卷四一》中的记载,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凉州崇军尚武,将才辈出。在东汉时期,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将军段熲。自东汉初期开始,凉州常常困扰于羌族的叛乱,成为东汉后期的极大祸患。面对羌人的叛乱,东汉朝廷束手无策,这时,武威人段熲被推上了历史舞台。段熲少时便“习弓马,尚游侠”,后入军旅,戍边征战十余年,平定西羌,击灭东羌,以功封新丰侯,食邑万户,历任中郎将、护羌校尉、议197郎、并州刺史、破羌将军。段熲以其平羌之功,威名远播凉州边关,被后世广为称颂。史学家陈寿评价道:“时太尉段熲,昔久为边将,威震西土。”段熲与皇甫规、张奂同时在东汉治羌战役中立功扬名,故而在当时,被称为“凉州三明”。

五凉时期: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

西晋时期,每当京师危难之时,晋愍帝司马邺想到的便是凉州刺史张轨。他说:“惟尔凉州刺史张轨,乃心王室,旌旗连络万里星赴,进次秦陇,便当协力济难,恢复神州。”《魏书·列传·卷五十七》也说:“河西捍御强敌,唯凉州、敦煌而已。”《资治通鉴·晋纪·十二》记载:“秦川中,血没腕,惟有凉州倚柱观。”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,当时凉州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,不仅能够乱世中自保,还能影响中原王朝的安危兴衰。

一、前凉称霸,旌旗猎猎

公元301年,张轨出任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,开始了他经营凉州的伟大历程。张轨上任之初,就着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凉州军队,以维持地方秩序和镇压敌对势力。河间王司马颙、成都王司马颖叛乱,张轨派兵三千,东奔京师保卫天子;鲜卑贵族若罗拔能反叛叛

李元辉
LIYUANHUI

甘肃武威人。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。先后在《甘肃日报》《民主协商报》等报纸杂志发表历史文化类文章300余篇。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汗血宝马》、诗文集《诗话天马故里》(与西木合著)、武威文史散文《天马长歌》(与张长宝合著)、武威非遗文化专著《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》(与赵大泰等合著)、五凉文化著作《话说五凉》(与徐兆寿合撰)、参编出版连环画《凉州会谈》。

乱,张轨派司马承祚讨叛敌,斩杀若罗拔能,俘虏十余万人。尤其是两次救援洛阳的军事行动,让“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”的歌谣广为传唱。张骏、张重华父子统治时期,前凉达到鼎盛,先后打退了刘曜、石虎的进攻,又西越流沙,攻打龟兹,西城诸国先后归附。前凉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西北边疆史的一部分,在西北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,它为中国西北地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乃至民族大融合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。正因为强大的军事实力,以及灵活的外交策略和发展经济的努力,成为当时中国北部较为安定的地区,都城姑臧也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中心。

二、凉州铁骑,两救洛阳

公元308年,王弥率数万叛军,进逼洛阳。西晋朝廷向凉州刺史张轨求救。张轨派凉州将军北官纯率兵救援洛阳。北官纯领命之后,精心挑选数千精兵,离开凉州,急速向洛阳进发。万蹄齐发,狼烟滚滚,旌旗飘扬,刀剑闪闪。北官纯率军抵达洛阳后,面对数万叛军,北官纯带领凉州铁骑横冲直撞,来回拼杀,把叛军阵形冲得七零八落,王弥叛军溃败逃走。公元309年,匈奴人刘渊派第四子刘聪率兵南进,大败西晋军队,再次抵达洛阳。西晋朝廷只好再次请求凉州刺史张轨派兵援助。张轨仍然派北官纯入援洛阳。北官纯率凉州铁骑,千里迢迢,来到洛阳,出其不意,夜袭匈奴大营,斩杀刘聪部下的征虏将军呼延颢,军威大振。此时,刘聪手下另一位得力助手大司空呼延翼又死于军中内乱,再加上西晋其他各路勤王军的陆续到达,刘聪被迫退军。解围之后,洛阳人民纷纷走上街头,为凉州铁骑点赞传唱:凉州大马,横行天下。凉州鹞鹰,寇贼消。鸱若翩翩,怖杀人。正是有了强大的战斗力,凉州铁骑才能在汉魏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,尽情演绎。

三、绝世宝刀,青史留名

五凉时期,河西一带军事强盛,兵器铸造业更是呈现出空前发展、繁荣的状态。公元318年,凉州刺史张寔下令锻造一百口“霸刀”,表示自己决心割据一方,成就一番霸业。刀身上铸刻一个“霸”字,足见其威名远扬,雄霸天下;公元389年,后凉开国皇帝吕光称“三河王,改元麟嘉,设置百官。同年,吕光锻造了宝刀一把,长三尺六寸,在刀背上铸刻“麟嘉”二字,故名“麟嘉刀”,以纪念其称王;公元399年,南凉秃发乌孤铸造宝刀一口,长二尺五寸,青色,因这口刀是大乙神“监制”,故名“大乙神刀”;公元401年,北凉沮渠蒙逊被推为大将军、凉州牧,改元永安。公元403年,他铸造一百口宝刀,刀背上铸刻“永安”二字,希望国泰永安,故名“永安刀”。刀铸成后,他东征西讨,使北凉成为河西最强大的割据势力;公元405年,西凉李暠改元建初,迁都酒泉,铸造宝刀一口,寓意与北凉争战百战百胜,故名“百胜刀”。

隋唐时期:节度河西,威震西北

隋唐时期,凉州成为抗击吐谷浑、突厥、吐蕃的前哨阵地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隋朝时期,废武威郡,置凉州总管府镇守凉州。唐初,凉州总管改置凉州都督,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兼最高军事单位,显示出凉州地区在有唐一代的军事、政治重要性。后设河西节度使,凉州成为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政治军事中心。著名学者严耕望在《中国历史地理·唐代篇》中写道:“凉州西控西域,北控回纥,南控吐蕃,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。”《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》铸刻有“其地接四郡境,控三边冲要”的文字,足以说明唐代的凉州成为西北军事重镇。

一、凉州出兵,突厥分裂

公元583年二月,突厥沙钵略可汗又派兵袭扰凉州一带。隋朝凉州总管杨爽兵分八路出击攻打突厥,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大军在大青山相遇,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大战。此役,突厥大败,首领沙钵略可汗身负重伤,侥幸逃命,直接导致了突厥的内部分裂。第二年,也就是584年,在隋军的不断打击下,突厥分为东、西两部,阿波可汗号称西突厥,沙钵略可汗为东突厥。

二、猛将精兵,聚于西北

为了有效地抵御吐蕃的进攻,进一步整合与加强防务,隔断吐蕃与回纥可能的联系,唐朝于睿宗景云二年(711年),对西北防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合,委任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,在武威设立河西节度使,史称“猛将精兵,聚于西北,军镇守捉,烽戍相望”。起初,河西节度使防御的地域广袤,统辖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、伊、

西共七州之地,后缩小为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五个州,但饶是如此,其管辖地域仍然十分广大,最后发展到下辖八军、四守捉的庞大规模,所辖各地都驻扎重兵布防,对吐蕃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河西节度断隔吐蕃、突厥,统赤水、大斗、建康、宁寇、玉门、黑离、豆卢、新泉八军,张掖、交城、白亭三守捉,屯凉、肃、瓜、沙、甘五州之境,治凉州,兵七万三千人。”另外,朝廷也十分重视河西节度使的人选,一批能征善战、谋略过人的将领相继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,如郭知运、萧嵩、崔希逸、王忠嗣、哥舒翰等,他们镇守一方,独当一面,战功卓著,为大唐西部防务的稳固作出了贡献。

三、西部屏障,军事中心

河西节度使的设立,使唐朝稳固了西部边防,大大减少了边患。从设立之初(711年)至安史之乱(755年)的近40多年,由于河西节度使的强势存在,唐朝在河西地区军事上一直保持优势。从开元二年(714年)秋开始,吐蕃连年犯边,但吐蕃始终未能越过河西一步。对于吐蕃来说,在河西节度使的镇守下,河西之地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,牢固地守卫着大唐的西部边疆。唐朝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,尤其河西节度使设在武威,让当时的武威城已升格为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政治军事中心。

夏蒙时期:河西根本,秦陇襟要
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:“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,是也。西夏得凉州,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,大为宋患。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,实秦陇之襟要矣。”凉州的战略地位提升到“河西根本、秦陇襟要”的地位。

一、开府西凉,西夏辅郡

西凉郡是西夏制取西蕃、屏蔽京畿、南接河湟、北通朔漠的西部战略要地。关于西夏的军事地理格局,有“灵州为腹,西凉为尾,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”之说。凉州“恃其形势,制驭西蕃,灵、夏之右臂成矣”。武威成为整个西夏右厢地区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西部门户,是西夏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。对于西夏来说,武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、军事保障的作用。1032年9月,经过几十年反复争夺,党项终于攻占了凉州。1038年,鉴于西凉府特殊的战略位置,西夏随之又将西凉府定为陪都,正所谓“大夏开基,凉为辅郡”。为了加强凉州的防御能力,防止吐蕃的进攻,西夏乾道元年(1068年)五月,西夏在原唐代凉州七城、周长22.5公里的基础上对西凉府城及周围塞堡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修建。西夏的西凉府有大小七座城池,分为内城、外城和关城三部分。西夏时期,凉州的兵器铸造业十分发达。1978年,在武威针织厂一座西夏窖藏中出土了一尊西夏时期的铜火炮,虽然造型简单,制作粗糙,但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管形火器,为我们研究古代火炮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二、大元故路,统辖河西

1226年,蒙古占领凉州,公元1237年,蒙古大汗窝阔台封太子阔端为西凉王,把原西夏故地封赐给阔端,从此阔端驻兵凉州。因为凉州在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,在经济上又处于与中亚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主要通道,因而对凉州的开发经营备受元朝统治者重视。元朝政府大力倡导地方养马,并且颁布相应的法律政策,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养马业的发展,河西一带也成为元代养马之地。1239年秋,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进入前藏,多达那波给阔端推荐邀请萨班大师来凉商谈西藏归属事宜。1260年,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期间,镇守凉州的只必帖木儿支持忽必烈,因此遭到阿里不哥党羽的攻击。凉州城经过战争的洗礼,已变得残破不堪,一片废墟。于是,只必帖木儿便在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地界筑新城,于元世祖至元九年(1272年)十一月建成,赐名永昌府。1278年,元朝在永昌府设立永昌路,降西凉府为州,隶属永昌路。当时永昌路所辖范围包括凉州、永昌、永登、古浪、天祝、民勤等地,从此,元朝在武威的统治中心,由西凉府转移到了永昌府,永昌府成了当时凉州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。1353年,元惠宗派甘肃行省平章政事、从一品大员镇南班为永昌宣慰使,总管当地军马,足见永昌路之重要。永昌路当时为军事要地,和平时则为商旅往来的重要交通驿站。

明初,朱元璋派大将军冯胜西征,占领凉州之后设立凉州卫,配置军力5600人。凉州是“通一线于广漠,控五郡之喉襟”的兵家必争之地,凉州的战略地位受到明政府的高度重视,明代重臣马文升曾经说过,“甘、凉地方,诚为西北之重地也。汉、唐之末,终不能守,而赵宋未能得。至我朝复入职方,设立都司,屯聚重兵”,一旦“甘、凉失守,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”。有明一代,凉州成为抗击残元势力的前沿,是捍卫西线的军事重镇,明朝十分重视对作为西北边镇重要城市的武威地区的经略。明朝从地区军事行政建制、修筑长城、养殖军马等方面对武威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,巩固了国防,安定了边境,武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也从中凸显。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,对凉州府设防也相当重视,修筑满城,凸显了武威的关键地位。

一、边塞藩篱,西北重地

《大明一统志》明确指出了凉州的地势险要,里面记载道:“河山襟带,为羌戎通译之路。环以祁连、合黎之山,浸以居延、鲜卑之水。凉州险绝,土地饶沃,万山环抱,三峡重围。”明代,凉州成为抗击残元势力的重地,涌现出了如达云、毛忠、张达等英勇善战的将领。为了加强防御,明洪武十年(1377年)都指挥濮英开始对凉州城进行规模较大的加固修筑。在隋李轨筑的城墙基础上“增高三尺,周减三里许,为十一里一百八十步,厚六尺”。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宋晟在武威城原有东南北三门的基础上增辟西城门,并修建了东、南、北三大城门楼。还修建了吊桥4座,挖了深6米多的城壕,在城墙四周修建箭楼、逻铺共36座。万历二年(1574年)在甘肃巡抚廖逢节、总督石茂华的指挥下,开始用大青砖砌土城墙,并增开了集贤门(东小南门),历时两年,到万历四年(1576年)四月完工。经过明代近200年的增修加固,武威城变得战守有备,成了河西走廊一座名副其实的固若金汤的城池。为了牢固掌握武威这一军事要地,除了在武威修筑长城、修建城池之外,还根据军事斗争和屯田需要,发动民工修筑堡寨,设立保甲制度,联防自卫。堡寨之名至今犹存,以堡、寨命名的村庄遍布武威全境,如凉州区的高沟堡、三岔堡、达家寨、丰乐堡、冯良寨,古浪的双塔堡、泗水堡,民勤的蔡旗堡、校尉营堡、青松堡等。

二、长垣坚城,保境安民

为防御残元势力,明代还在武威修筑边墙。武威明边墙长约431.25公里,其中,天祝境内一条,古浪境内三条,凉州区两条,民勤县两条。武威境内的明边墙修筑于明朝中后期,历时上百年,有“旧边”和“新边”之分。武威“旧边”修筑于明朝中叶。明初即设甘肃镇主持河西防务,明正德年间(1506—1521年)对汉长城进行过修筑加固,“逾庄浪至凉州”,贯通武威三县一区,全长328.65公里,大致与汉边相向而行。嘉靖十六年(1537年)巡抚赵载修筑镇番西(今甘肃民勤)临河墩至永昌卫城(今甘肃永昌县)土垣、沟堑百余里。武威“新边”指靖远哈思堡至古浪县泗水堡西北犄尖吞见的墙垣。明军收复松山之后,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李汶率部构筑东起永安寨,经泗水、古浪土门间长约200公里的长城,同时沿线建造烽燧120余座,并在松山、大靖、土门、裴家营、红水等重要地点修筑城堡,形成了一道直接连接河西重镇武威与秦桥黄河渡口的布局严谨、设施完备的新的长城防御体系,此即万历所筑的“新边”。由此河西走廊东部就有了新旧两道边墙,为防御敌人、保境安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三、一线岩疆,三边重镇

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,对凉州府设防也相当重视,《大清一统志·凉州府》记载:“天梯宁夏,沙河绕后。左有古浪之险,右有西山之固。东控宁夏,南距黄河,西连番部,北际沙漠。一线岩疆,三边重镇。”清朝初年,重要的军政衙门甘肃巡抚曾一度驻于凉州,可见凉州的重要军事价值。年羹尧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,清朝致力于消除甘肃等地潜在的叛乱因素,进而加强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有效控制。八旗与绿营驻军是清朝在凉州的主要地方军事力量。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设甘肃凉州八旗满、蒙、汉兵凡两千人。乾隆二年(1737年),清朝在凉州府城东1.5公里处修筑满城(即今新城),驻扎满族旗兵,设凉州将军、副都统各一,下设协领二人,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十人,率率驻防八旗满蒙官兵2600人。凉州满城与宁夏满城、庄浪满城三足鼎立、互为犄角,牢牢钉在汉、蒙古、回、藏诸民族交错分布的河陇之地,成为清王朝经略西北、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依托。其次,由绿营兵(即地方武装)防守各隘口要地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:“凉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,兼辖永昌、庄浪二协。镇标中营、左营、右营、前营、后营,西把截堡,永昌协,宁远营,水泉营,新城营,张义营,镇番营,安城营,大靖营,土门营,庄浪协,俄博岭营,松山营,镇羌营,岔口营,红城堡,红水营,三眼井营。”如在大靖,根据地理位置和战略需求,分别在大靖、裴家营、阿巴岭等城堡设营驻军防守。此外,在边墙烽墩派哨兵驻守。为防止敌寇进犯,在长城以外通往贺兰山、北套、镇番等路上,设隘口伏防、瞭望敌人出没。如此重兵驻防,凸显了武威的关键地位。

(原文刊登于《人文甘肃》第七辑)